

# 从“五七”到“五四”

## ——“五四运动”诠释的发生及其初期演变

徐佳贵

【摘要】对于“五四运动”的“诠释”，自始便在指涉的参与主体与活动方式上呈现出一定的倾向性与选择性。此类诠释脱胎于充斥着“五七”（或“五九”）符号的政治运动氛围，却又不约而同地着力于淡化1919年爱国运动中“承前”的一面，进而构成了对于该年反日运动实际之复杂脉络的“简化”。而在另外的维度上，此类诠释又开始了“再复杂化”：究应择取哪些事件与趋势以接在“五四运动”之后，答案言人人殊，这又反过来使得该词的诠释走向多歧化。之后，“五七”与“五四”两个符号并存，二者的诠释尚可相互影响。考察“五四运动”诠释发生及其初期演变的过程与逻辑，有助于今人更深入地认识“五四的历史”与“历史的五四”之间关联与张力的缘起。

【关键词】“五四运动”；“五七”；“新文化运动”；学生运动；国民运动

【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20)02-0131-15

【作者简介】徐佳贵，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0235

近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的新趋势之一，是引入较宽泛意义上的“概念史”取径，回归历史现场考察当时的用语及语义演变。如对于“新文化运动”等语词，历来学者多已指出其在各人表述中意思各异；但仅罗列出这些意思是不够的，学者在析论“新文化运动”一词的初期历史时，亦已指出尚须“分辨词义之流变”。<sup>①</sup>而相对“新文化运动”，同样带上引号的“五四运动”，似乎仍被学界普遍视为一个初始意涵无须深论的语词，学者通常仅关注其在文本中最先出现的位置。这当是由于“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存在一大不同：前者最初的所指本身尚较明确，不似后者在诞生伊始的所指便言人人殊。“五四运动”蕴含的复杂性，在于相关的阐释性的内容，如所谓“五四运动”的“精神”“性质”“价值”“意义”等，此类内容，本文统称之为对于“五四运动”的“诠释”。进言之，“五四运动”并非只能与“新文化运动”之类的语词发生关系，其初生时的语境，与“五七”国耻纪念的相关性可能反而更为突出。使“五四(运动)”在诠释中适度（不是完全）松脱与“五七”的关联，而后与包括“新文化(运动)”在内的其他语词符号发生（对于某些人而言更紧密的）联系，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过程。显然，许多语词经由不断叠加或修改的“诠释”，方能产生足以传世的重要价值，甚至可以带动语词本身所指的后续变化；本文对于“五四运动”之诠释的梳理，即针对如下问题：在其初期的历史中，“五四运动”是如何“被赋予”在“思想史”中的重大意义的？这也应有助于进一步缓解现今外交政治的与思想文化的五四研究往往打成两橛、各说各话的问题。<sup>②</sup>

为免枝蔓，本文聚焦于对诠释或表述本身逻辑的梳理，其背后各相关政学人物与势力之间的互动详情，只有俟诸另文。而为免研究者自身用语掺入历史语境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将对文中用语作

<sup>①</sup> 周月峰《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1期。

<sup>②</sup> 论者已指出“五四运动”一开始被定性为“爱国运动”，而“启蒙运动”“文艺复兴”的定性都是后来才出现的。见李少兵：《爱国、启蒙和文艺复兴——五四运动的定性及其历史解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笔者不否认“五四运动”最初“爱国运动”的定性，唯认为尚须讨论其他一些定性的“雏形”是怎样出现的。

如下处理:1. 1915年后,“五七”与“五九”均为国人视作“国耻”纪念的日期符号,但为求行文简洁,在未作特别说明时,以“五七”同时指代“五七”与“五九”。2. 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反日爱国运动,文中称“五四事件”,不加引号。3. 五四事件及以后1919年各地的反日爱国运动,统称“民八反日运动”,不加引号,其中重点为五六月间的反日爱国运动,1920年代初所谓“广义的五四运动”即是指此。4. “五四运动”若未加引号,则均是在援引后日学者之用语的意义上,而非出于时人之口。

## 一 1919年的“五七”

今人多将1919年5月4日之后全国各地的爱国运动自然而然地视作对北京五四事件的“响应”。但实际上,这些运动当时多在“五七”或“五九”的旗号下进行,因其时多数人意料之中的,是借巴黎和会山东问题发酵而将形成规模的5月7日或9日的“国耻”纪念活动。此“国耻”源自1915年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5月7日系该年日本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之日,5月9日为北京政府覆文之日。早在该年5月中旬,北京商界便已联合各界发起“五七会”,计划每年开会纪念“国耻”。<sup>①</sup>上海则曾发行《五七报》,旋于6月间因“词旨激烈”被查禁。<sup>②</sup>除却“五七”,“五九”这一日期缩略语在当年也已出现。<sup>③</sup>经由政、商、学各界的宣扬与制度化,这两日之后便成为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最重要的两个“国耻”纪念日。<sup>④</sup>

1916—1917年的国耻纪念相对沉寂,至1918年,始于留日学生抗议并归国,国内大城市学生积极参与的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签署的活动,大多已打出纪念5月7日(或9日)“国耻”的旗号。<sup>⑤</sup>至1919年5月初北京学生在获知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后,原也是拟于7日组织活动,因担心“时间拖迟,消息泄露”,方提前至5月4日游行。<sup>⑥</sup>5月4日系周日,便于组织校外活动,且学生不必为此付出罢课的代价。而也正因为是周日,学生递交请愿书的对象——各国公使亦不在使馆,这一点却似未在多数学生的预料之内。在东交民巷被阻,队伍转向后,便即出现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的意外(或者说这只是游行队伍中的少数人,如北京高等师范一小组织“意料中”的行动),在意外的日期举行的游行请愿,又酿成了堪称意外的结局。

换个角度看,日期提前,也正导致了北京五四事件总体上未受当局的有效阻挠。而在外交失败的消息回传国内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研究系及其影响下的国民外交协会,定于5月7日在京发动“国民大会”,于事前在报中布告,这最终却起到了反作用:北京当局鉴于7日活动本在预料中,且有4日的前车之鉴,已对该日大会严加防范。7日当天,原定会场中央公园被军警封闭,与会市民在各临时场所之间“疲于奔命”,终仅实现数百人集会。<sup>⑦</sup>而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亦定于5月7日在东京举行示威游行,虽与1918年在示威前一日(5月6日)诸多与事学生即遭日警逮捕不同,1919年的“国耻”纪念日留学生仍得上街游行,但此番同样遭到日方严厉镇压,并发生流血冲突。<sup>⑧</sup>可见5月7日系各方“意料之中”的性质,正是一把双刃剑,中日当局均可有备而来,对活动施加显著的负面影响。

① 《交涉结束后之北京各界观》《京师商界发起五七会》,《申报》1915年5月15日,第6、11版。

② 《干涉言论愤激之报纸》,《申报》1915年6月17日,第10版《五七报禁闭后之余波》,《新闻报》1915年6月29日,第9版。

③ 《爱国报》,《申报》1915年8月30日,第7版。

④ 参见马建标《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一战前后中国国耻记忆的形成与演变》,《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2期。据目前所见材料,似是北方多纪念“五七”,南方则“五七”与“五九”都有纪念。

⑤ 黄福庆《五四前夕留日学生的排日运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期,1972年。

⑥ 周予同《五四回忆片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65页。

⑦ 《国耻纪念日之国民大会》,《晨报》1919年5月8日,第2版。

⑧ 参见王拱璧《东游挥汗录》,上海留日学生救国团本部1920年版,第55—77页。

在上海,“国耻”纪念活动的组织者则设法通过与地方当局协调,减轻来自官方的压力。其中,位于上海的江苏省教育会是1915年反“二十一条”活动的重要参与者,自1918年起,它与该年成立的留日学生救国团共同组织上海等地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活动,至1919年,二者又成为5月7日上海“国民大会”的主要组织者。<sup>①</sup>另如上海对日外交后援会“派会员分往各省连络各界,就地开会”则是以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期”。<sup>②</sup>在京、沪以外,如天津、济南、南京、苏州、杭州、宁波、武汉、南昌、太原等城市,亦是于5月7日或9日举行国耻纪念大会,这些集会也多被后来的历史书写视作该地五四运动的起点。当然,一些地方当局的预先防范,也会与北京一样产生遏制作用,如湖南长沙由于省军政当局厉行戒严,两个“国耻”纪念日似乎均未实现大规模的集会活动(至5月底6月初方有较大规模的反日运动)。

不仅如此,“五七”符号亦频频出现于当时报刊的新闻社论中。除却不胜枚举的对于1915年“二十一条”交涉情形的追溯,另如5月7日当天,北京学生亦是“各执‘尔忘五月七日乎’小旗一面”,至警厅前欢迎五四事件中被捕的同学释放。<sup>③</sup>5月19日后北京学生总罢课,此时“五四运动”一词已被发明,但北京学生联合会发行的仍是《五七》日刊(后遭当局查禁)。<sup>④</sup>其时京沪各大报纸也多提前登出7日纪念活动的启事,及9日学校停课、书局或工商停业的广告。5月7日,北京《晨报》于首版登出大字“今日何日?五月七日。国耻纪念,国人勿忘。”第6—7版即为“国耻纪念”专版,刊登数篇国耻纪念感言及1915—1918年的相关中日外交文件。5月9日,上海《民国日报》亦辟出第8版的一半版面作为“国耻纪念”专栏。

可以说,上述活动实践与相应的舆论,诚然多有“响应”北京五四事件的一面,但显然也都是“五七”符号所承载之历史记忆的延续;不少参与者本系有备而来,而非纯是北京五四事件所激。进一步讲,同样显见的是,此间得到延续的,还有反日运动的参与群体与活动方式。在参与者一面,今有学者总结1915年“五七”(原文用“五九”)与1919年“五四”的区别,前者的参与者主要为“城市士绅、商人”,后者则是“青年学生为主,商人、工人声援参与”。<sup>⑤</sup>但事实上,“城市士绅、商人”在1919年的反日运动中亦多有活动,其主持或参与的教育会、同乡会、商会等组织,至少在反日运动初始阶段表现积极。此外,各省多由城市士绅主持或参与的议会,同样是晚清民初即已成立(晚清称咨议局)并产生重要的政治影响的一支力量,1915年时虽暂不存在,1919年却发挥了积极作用。今有学者已就南北各省议会在五四运动中的角色作了专门研究,强调省议会显示了一种“国家权力体系内的制衡”,对运动直接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的“特殊意义”。<sup>⑥</sup>其中,北方省议会虽整体较南方省份消极,但山东、顺直省议会仍表现突出,尤其是作为直接当事方的山东省,其省议会自4月起便在省内组织数次万人规模的集会活动,在整个五六月反日运动期间的表现比鲁省学生还要积极。<sup>⑦</sup>而其时“权力体系内的制衡”,且可出自北洋系内部,有学者指出直系将领吴佩孚等因其6月以降表露的反对签约立场,而成为五四运动期间的政坛之星。<sup>⑧</sup>另如南京5月9日的国民大会,据称初由教会发起;<sup>⑨</sup>广州5月11日的国民大会,系广州国民外交后援会牵头。<sup>⑩</sup>略如康有为通电中所言,曹

① 《五月七日之国民大会》,《申报》1919年5月8日,第10版;《万众一心之国民大会》,《民国日报》1919年5月8日,第10版。

② 《国耻纪念中之青岛问题》,《时事新报》1919年5月6日,第3张第1版。

③ 《被捕学生全体释放》,《晨报》1919年5月8日,第2版。

④ 《勒停〈五七〉及检查他报》,《民国日报》1919年5月27日,第3版。

⑤ 王奇生《亡国亡省亡人——1915—1925年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之演进》,刘杰、川岛真编《对立与共存的历史认识:日中关系15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5页。

⑥ 王续添《论五四运动中的省议会》,《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4期。

⑦ 《山东安福部之捣乱与被捣》,《晨报》1919年7月25日,第2版。

⑧ 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39—240页;马建标《媒介、主义与政争:五四前后吴佩孚的崛起与权势转移》,《安徽史学》2017年第4期。

⑨ 《南京之国民大会》,《民国日报》1919年5月9日,第3版。

⑩ 大中华国民编《章宗祥》,上海爱国社1919年版,第84—86页。

汝霖、章宗祥等“国贼”的“徒党亲戚”“必无四百人以上”，在其对立面则可以有“四万万人”。<sup>①</sup>总之，其时北京当局（多指皖系、安福系、新交通系）实属“千夫所指”，在此“千夫”之中既有学、工、商等较普通的民众，也有老辈名流、教会及现有权力体系内的多支力量。

在活动方式一面，1915年5月7日（或9日）前后反“二十一条”的活动方式，在1919年也均有体现。一是集会通电，相关主张包括以下四个主要目标中的全部或数项：释放学生（主要是5月4日后及6月3日后两个时段）、干涉北京教育界人事（主要是挽留北大校长蔡元培与/或教育总长傅增湘）、罢免曹陆章、拒签和约。二是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用这两种方式者包括学生，也包括其他精英与民众组成的团体。三是救国储金，1919年的报刊亦屡屡登载此方面的倡议与活动，只是实际集资的成效或更逊于1915年。

以上所述，即是民八反日运动中“承前”的一面，而这一面多是（不一定全部是）在“五七”纪念的旗号下展开。虽然学生群体在此次运动中的表现空前亮眼，但今日从政治史角度研究五四运动的学者也已多意识到上述非学生、非一般工商的势力团体在其间的重要性。这些团体的言行不尽出于被动，也并未纯以学生之意向为转移。而北京五四事件，首先也只是该年反日风潮的“起点”之一（不是唯一起点，因山东的反日群众运动早已开始），人数规模也不是最大（上海国民大会规模便大于北京）；此一“起点”定为“焦点”，甚而从中产出异于“五七”的崭新符号，尚有一个表述与话语层面的展开过程。

## 二 “五四运动”诠释的发生

据今人考证，“五四运动”一词，最早应出现在5月14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致各省各团体电》（寒电）中，该电最早刊发于5月19日的上海《民国日报》。<sup>②</sup>但翻查史料，“五四运动”见诸报端的最早时间似可商榷，因5月16日北京《晨报》、18日上海《申报》中已登出同一封致“北京报界函”（作于15日），其中提到：

日内北京发现一种传单，内以敝会名义，鼓吹无政府主义，阅之殊深诧异。查无政府主义以世界为指归，首先破除国家界限，敝会发端于“五四运动”之后，为外交之声援，作政府之后盾，实寄托于国家主义精神之中，则是敝会与无政府主义根本冲突。诚恐该项传单含有别种用意，特函声明。<sup>③</sup>

这里是北京学联意在撇清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以回应当时称学生行动是受“过激主义”影响的指责。至5月20日，北京《晨报》又登出北京学生拍发于18日的《罢课宣言》（巧电），及康白情作于14日的《北京学生界男女交际的先声》一文，其中亦使用了“五四运动”一词。<sup>④</sup>在5月20日后，京、沪大报中便开始屡屡使用“五四运动”一词，而其所指亦颇明确，即专指该年5月4日发生于北京的反日爱国事件。

上述京、沪大报中的材料亦可表明，至5月20日左右北京学联写入正式电稿或函件的内容仍偏向“国家主义”，且声明自己是作为“政府之后盾”，虽对曹陆章等“国贼”大加挞伐，但并未反对整个北京政治当局。然而问题在于，五四事件发生后围绕事件的舆论即已展开，而此类舆论不尽操诸与事学生之手，甚至可能与自认代表与事学生的北京学联自身的某些“稳健”表态产生一定的歧异。

① 《康南海请诛国贼救学生电》，《晨报》1919年5月11日，第3版。

② 杨琥《“五四运动”名称溯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3卷第2期（2006）。寒电电文见《再接再厉之北京学生》，《民国日报》1919年5月19日，第2版。

③ 《来函照登》，《晨报》1919年5月16日，第6版；《京学界之最近消息》，《申报》1919年5月18日，第7版；《晨报》版“一种传单”脱一“单”字。按李里峰《“运动时代”的来临——“五四”与中国政治现代性的生成》（《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8期）一文也已注意及此。

④ 《学界风潮愈闹愈大》，《晨报》1919年5月20日，第2版；康白情《北京学生界男女交际的先声》，《晨报》1919年5月20日，第7版。

“五四运动”的“诠释”并不紧密贴合该词最先一批使用者之意见的性质,于此已见端倪。

最初的舆论,多聚焦于五四事件的最末一环,即火烧曹宅、殴章宗祥是否正当,涉事学生应否法办。显然,这一环节也是五四事件最大的出人意料之处。因1915—1918年的反日集会活动,基本标榜合法、和平手段,对北洋中央政府的攻击,多出现在一些政派与报人的言论中而非街头实践中。<sup>①</sup>1919年5月4日游行的原计划,至少在多数组织者及与事学生看来亦当出以和平形式。<sup>②</sup>可是,标榜和平的自我禁抑被事件的实际进展打破,一些对行政当局已深有不满意的报人与知识分子遂有意为学生酿成的“意外”辩护,进而撑开豁口,使当局的权威进一步坠地。

与1915年不同,1919年当时,北京政府对于京沪大报舆论基本处于失控状态。<sup>③</sup>这一问题至此开始全面发酵。除梁漱溟等个别人强调纵火打人违法,大多报刊舆论均倾向于认为学生“情有可原”,不应判罪。早在5月5日刊出五四事件详细报道的《晨报》,便试图为对事件的理解定下基调:“学生举动诚不免有过激之处,但此事动机出于外交问题,与寻常骚扰不同,群众集合,往往有逸轨之事,此在东西各国数见不鲜,政府宜有特别眼光,为平情近理之处置。”<sup>④</sup>相应地,论者亦开始聚焦于事件的参与群体问题。通常认为,此次事件以学生群体为主,上引5日《晨报》报道亦将之定性为“学生界行动”。而在北大任职的高一涵一度将之认作“市民运动”,因据他亲眼观察,“参与其事的有许多工人,许多商人,和许多须发皓然的老青年”,而不仅是学生。<sup>⑤</sup>只是这在5月间似未成为主流看法。事实上,学生群体虽自1915年起便参加了反对“二十一条”的运动,但至1919年,学生酿成殃及当局要员之事,才被各大报章视作正式登场的关键力量,不独“无罪”,甚且功勋卓著。其中如具有原国民党人背景的《民国日报》的社论,甚至把学生推高到“五月七日之神”的地步。<sup>⑥</sup>北京《晨报》中顾孟余来稿及上海《时报》附张《教育周刊》中蒋梦麟的文章,均强调此次事件展现了“青年”的“新精神”。<sup>⑦</sup>而5月18日后,“五四运动”一词开始被京沪大报广为使用,因该词的发明者为北京学生,故也利于论者的视线进一步集中于学生群体。且“自五四运动以后/以来……”的句式亦迅速在各大报中流行,这通常便是将五四事件的后续发展,尤其是学生或学界的动向纳入此一句式中(如挽留蔡元培、北京学生总罢课等)。

再后,论者不再仅仅提倡“青年”之新精神,且给出了“五四运动”之“精神”的提法。5月26日,北大学生罗家伦于《每周评论》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这是目前公认的最早全面阐释“五四运动”意义的文字。文中指出,所谓“五四运动”是指“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几千人因山东问题失败,在政府高压的底下,居然列队示威,作正当民意的表示。这是中国学生的创举,是中国教育界的创举,也是中国国民的创举”。进而归结出运动的“三种真精神”,“可以关系中国民族的存亡”,即“学生牺牲”“社会裁制”“民族自决”。<sup>⑧</sup>有别于笼统宣扬国族主义,罗的阐发富于层次感,重点则在运动作为“创举”的意义,以“学生”为轴心,进而凸显“国民”对于政府中“卖国贼”的法外制裁及本“民族”对于列强的抵抗,这一路数便成为“五四运动”诠释的一个早期的“模板”。

需要指出,罗家伦本人在五四事件至5月中下旬的学生运动中的实际地位,似不宜估计过高。如所周知,罗曾用白话为5月4日游行起草北京学界宣言,与罗一同主持北大新潮社的傅斯年,在

① 参见罗志田《救国抑救民——“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与辛亥五四期间的社会思潮》,《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86—91页。

② 参见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30页。

③ 参见冯筱才《政争与“五四”:从外交斗争到群众运动》,《开放时代》2011年第4期。

④ 《山东问题中之学生界行动》,《晨报》1919年5月5日,第2版。

⑤ 涵庐(高一涵):《市民运动的研究》,《晨报》1919年5月6日,第6版。

⑥ 楚伦《五月七日之神·北京学生》,《民国日报》1919年5月7日,第2版。

⑦ 顾兆熊(孟翁):《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晨报》1919年5月9日,第6版;梦麟《青年之新精神》,《时报附张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1919年第12期,1919年5月12日。

⑧ 毅(罗家伦):《“五四运动”的精神》,《每周评论》1919年第23期,1919年5月26日。

五四事件中亦负游行总指挥之责,但二人在4日当天均反对部分学生转往赵家楼扩大事态。<sup>①</sup>而在4日晚(一说5日)的会议中,傅斯年反对实施罢课,与他人发生肢体冲突,之后傅对于学生运动便转趋消极。<sup>②</sup>罗家伦亦被怀疑与安福系有“勾结”,据称在这些攻击傅、罗的学生看来,“做白话文的都不是好东西,凡提倡什么新思想的也不是好东西”。<sup>③</sup>康白情《北京学生界男女交际的先声》一文虽用到“五四运动”一词,但仅用于指代事件,而未作阐发。北京学联起初的主席是北大《国民》杂志社的段锡朋,而前引16—20日间见诸报端的三份北京学联的宣言电稿均倾向宣扬国族主义,可能也主要是反映了国民社(而非新潮社)同人的意见。然而,在学生运动中的实际地位存疑,不影响罗家伦敏锐地发现“五四运动”的符号价值,并争得其最初的“诠释”之权。此后罗、傅等人有意将“五四运动”的后续引向(新)文化运动,其可能性亦是由此发展而来。

在诠释主体上,大力阐发北京五四事件之“开创”意义,以至阐发“五四运动”之“精神”的舆论,主要来自不满北京当局行政或一贯趋新的部分政派分子(主要是研究系、原国民党人)、报人与知识分子(包括教师与学生,尤其是身在高校或有高等学历者),这与5月间反日运动实际的参与者(除青年学生外尚有较老辈的议员、士绅名流等)并不完全一致。而在诠释内容中,“五四”后加“运动”,而非“事件”之类,<sup>④</sup>或也正意味着突出某类“运动”主体,如上所述,这一主体在初期主要指向学生。至6月5—12日上海发生旨在迫使当局罢黜“国贼”的罢课、罢工、罢市运动,“三罢”风潮并向其他地域扩散,相应舆论所称“运动”主体的涵括范围,遂从以“学生”为主、一般“市民”或“国民”为辅,演变为将普通的“工”“商”人等明白无误地收纳其中。北京“五四”与上海“六五”(或北京“六三”)二“运动”时而并举,被视为一个“运动”,如杨贤江所云“此次运动,虽起自北京一隅,然响应之者遍乎全国,又不特学界,而商界工界,亦闻风而起,一致行动,其结合之大,势力之厚,为我中国所未曾见,外人誉我为国民运动、国民自决之第一步,卒借此以达到吾人之要求,则知合力之效诚可惊也。”<sup>⑤</sup>在他看来,此次终能取得罢免曹陆章、拒签和约的“可惊”成效,完全是学、工、商三界的“国民”联合行动的结果。

论者开始将五六月间的运动视作一个理所当然的连续体,而前引富于层次感地指认“学生”“国民”“民族”等主体、着重开创而非传承的“五四运动”诠释,对此连续性“运动”之主体范围的延展方向,似也继续发挥着“引导”作用,即持续压抑上节提及的“国家权力体系内”力量的存在感。这诚然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如6月初的“六三”大拘捕,北京军警较前更加大力地压制学生与民众运动。然而也是在6月间,吴佩孚等直系人物持续向北京政府施压;且早先自居“民”之代表的各省议会、教育会等,在其间的角色亦未消失,尤其在“三罢”结束后,对于拒签和约仍在发挥积极作用,此种作用却已为不少人有意无意地淡化乃至忽略。基于早先积累的对于各类“民”之代表的失望,以及增长中的对更直接的民众政治的希冀,“五四”“六五”的多数诠释矮化甚或抹煞了反日运动中“民”之代表的实际作为,由此,“国民”之所指在这些论者那里,也便发生了进一步的“下”移。<sup>⑥</sup>

在此方面,除却大报舆论,尚须略述稍后聚焦于五六月间反日爱国运动的资料编纂。今人多将

① 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29页。

② 傅乐成《傅孟真先生与五四运动》汪荣祖编《五四研究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272页;罗家伦口述,马星野整理《我所参与的五四运动》,陈占彪编《五四事件回忆:稀见资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68页。

③ 柏生《杂感·五四四日》,《晨报副刊》1922年5月4日,第3—4版。

④ 据笔者检索所得,此前“运动”一词在清末民初报文中常见三种用法:1.“运动”他人做某事;2.体育“运动”,“运动会”有时亦简称“运动”;3.社会、群众、劳工“运动”等。“五四运动”应属第三种用法。而日期缩略语后加“运动”,可能系当时北京学生首创(或有当时朝鲜等殖民地独立“运动”之报道的影响)。关于“运动”(movement)一词截至五四的跨国传播及其意义,参见 Rudolf G. Wagner, “The Canonization of May Fourth,” in 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and Oldřich Král eds., *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s May Fourth Projec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 pp. 69—95.

⑤ 杨贤江《新教训》,《学生》第6卷第7期,1919年。

⑥ 当然这可能与一些省议会在五六月间的措置有关,如江苏、浙江省议会虽表态支持爱国学生,却又积极运动议员加费案,引起公愤,上海等地报纸屡加挞伐,进一步恶化了省议会的形象。教育界老辈及各省教育会的情形相对复杂,见下节。

这些出版物单纯视作五四运动“资料集”，<sup>①</sup>而本文则进一步考察其编纂形式本身可能反映的编著者的思想倾向。首先是1919年5月下旬初版于上海的《章宗祥》一书，其中按“北京学界之奋兴”“救护学生之公电”“上海国民大会之激昂”“广州国民大会之盛况”“留日学生之继起”的顺序对反日运动初期的情况作了记述。<sup>②</sup>1919年6月28日初版、7月7日发行的《上海民潮七日记》，系6月5日—12日上海报纸关于“三罢”运动的文件汇编，将“上海民潮发动之起点”溯至5月7日上海国民大会，之后才有“各学校、各商团、各平民结合之会社，纷纷加入”。<sup>③</sup>1919年7月上海出版的《上海罢市救亡史》，亦系编日体，从5月1日陆徵祥电告日本对山东的要求开始记述。<sup>④</sup>以上数种出版物，虽强调“民气”之昂扬，但似未凸显既有的“民”之代表与一般民众的区别，或格外突出学生或学界在反日运动中的角色。

1919年6月25日上海出版的《上海罢市实录》则在按地区（如全埠、城厢、各租界、闸北等）分编报文之后，又依据一些“界别”，如官厅、学生、公共团体、工商业团体等编辑沪报资料。<sup>⑤</sup>同年6月末在上海出版、7月再版的《曹汝霖》，已在下卷中专门突出“工商学”在“声讨曹汝霖”活动中的角色。<sup>⑥</sup>至8月初，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青岛潮》，该书旨在回顾五六月间反日运动的整个过程，主要按“界别”编撰内容，而其间各“界”的等第次序，已更形明确。在回顾外交失败之成因后，便自“北京学生爱国之愤潮”一章开始，继以“各省学界之奋兴”“留学界之助动”“女学生之热忱”数章。详述“学界”完毕，又专列“全国商界之崛起”“农工各界一致行动”两章，所谓“农工各界”除“工业界”“农界”外，尚包括“劳动界”“军警界”“花界”。这里的“军警界”或有一定权力体系内部力量的意味；而编者也承认，“农界”尽管列名，实际并无多少响应动作。但“各地国民大会”“学商外公私立各机关之言动”（包括新旧国会、各省议会、留日学生救国团、同乡会及其他政治团体）尽管内容不少，却是在“花界”（妓女）之后，分列两章。最后结以两章“北京政府及官厅之压制”“日人之态度”。<sup>⑦</sup>可见《青岛潮》之叙史，尤重身处既有国家权力体系以外的“国民”，“国民”之中又尤重“学界”，“学界”之中又尤重学生，此外多由士绅名流组成的势力团体，则只能排在其他所有一般“国民”的等第之下。

至9月间，上海中华书局印行《学界风潮纪》，明以北京、上海及至各省的“学界”为主要对象。<sup>⑧</sup>《申报》所登该书广告，且将此番“五四运动与六五运动”抬高到“吾国办学以来唯一之风潮”的地位。<sup>⑨</sup>而同在9月，北京“五四编辑社”编著的《五四》一书出版。虽然书中的“五四运动”仍是专指五四事件，但部分或是由于编著者蔡晓舟、杨量工系北大学生，该书明确以北京或北大为主视角，以“五四运动”之后续“响应”（包括“六五”运动）来统摄五六月间的全国反日运动。在专章详述“五四学生示威之始末”后，为“五四运动各界之响应”一章，首叙“京外学界之响应”，继以“工商各界之响应”。再后列出“舆论”“文电录要”两章，亦以收录针对学生的舆论及学生所发文电为主。<sup>⑩</sup>北京的“起点”定为“焦点”，同时从学生、工商民众再到其他势力团体，重要性逐级递减，这一后世常见的五四运动史之叙述框架，至此已大体形成。

1919年10月，上海《建设》杂志刊出沈仲九所作《五四运动的回顾》一篇长文，一定程度上可被

① 以下引及的几份出版物均曾编入《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但因基本被当成“资料集”，一些内容在编辑中被删改。以下均引用较早较完整的版本。

② 大中华国民编《章宗祥》。

③ 杨尘因编著《上海民潮七日记》，上海公民社1919年版。

④ 吴中弼编纂《上海罢市救亡史》，上海中华国货出版社1919年版。

⑤ 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上海公义社1919年版。

⑥ 粤东闲鹤编著《曹汝霖》，上海华民书社1919年版。

⑦ 龚振黄编《青岛潮》，泰东图书局1919年版。

⑧ 警鑫编《学界风潮纪》，中华书局1919年9月版。

⑨ 《五四运动与六五运动之真相·学界风潮纪》，《申报》1919年9月29日，第14版。

⑩ 蔡晓舟、杨量工编辑《五四》，北京蔡寓，1919年9月。

认为是对上述“五四运动”诠释之倾向性的一个早期的总结。<sup>①</sup>沈氏首先指出,他是从“北京的新闻纸”上了解到“五四运动”这一“专名词”的;在此“五四运动”可以包含后来的“三罢”运动,这运动“是中国空前的运动,是中国教育界空前的运动,改造中国的教育潮,恐怕发源在这运动里面”。这里已为诠释定下基调,即“五四运动”必定是“空前”的;而作者的第一“感想”,亦在发掘该运动的“特色”,所谓“特色”是“专指过去的中国而言,就是中国以前没有的意义”。这便将五四事件及之后夏季反日运动中的“承前”一面预先作了清理,中国以前“已有的意义”,已经从此番诠释中尽可能地被剔除了出去。

这些具体的“特色”,应是承自罗家伦《“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主要包括“学生的自觉”“民众的运动”“社会的制裁”三点。在第一感想后,又相继列出六条感想,均强调了此次“五四运动”在各方面必定是“前所未有的”这一预判。第七感想是“五四运动”对将来的影响。作者将“‘五四运动’直接的效果”尽量缩小,称“无非免了曹陆章三个卖国贼的官职,这种形式上的利益,尚是狠小狠轻的”。大的效果则在“一般国民因为有这种运动,于无形中得了许多新教训,养成了许多新精神”。其一是“平民势力的发展”,“五四运动”中“学生不受学校的束缚,商人不受商店的束缚,至于官厅、家族、社会,种种束缚,更丝毫不受”。其二是“社会组织的改善”,对此沈氏明言:

代表一部分教育界的教育会、代表全体人民的议会,或者处于第三者地位,替学生向政府喊话,或者闭口不言,照这种情形看起来,彷彿这种代表机关和首领不好攻击政府的,他们的地位,好像处于人民和政府中间,只好在两旁冲突的时候,出来做个调人。唉,这种代表机关,还可以当“代表”两个字么?……此番的运动,都是各学校学生各商店伙计直接行动的力量,就是代表机关和首领失效的大试验。

这段话便将反日运动中教育会、议会等的作用基本抹煞,将对于“民”的既有“代表”机制整个负面化。如此,“五四”话语便进一步凸显了此期的新力量及相应的某些活动方式,而与多由“五七”标示的既有力量与方式拉开了距离。

诚然,在某些细节上,该文所论或只是“一家之言”;但其在整体上的某些倾向性,在之后不同阵营的论者言说中尚可继续得到展示。1920年4月,陈独秀在一次题为“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的演说中强调“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一是“直接行动”,二是“牺牲的精神”;关于前者他便提到,之所以“对于五四运动有新的和前次爱国运动不同的感想,就是因为学生运动是直接行动,不是依赖特殊势力和代议员的卑劣运动呵!”<sup>②</sup>

至1920年5月4日,北京《晨报》开展“五四”周年纪念,专刊汇集了不少政学界要人的文章,对之后“五四运动”诠释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一文,<sup>③</sup>在总结“五四运动”“成功的方面”时,亦强调“这种成功却不是拒签德约,也不是罢曹、陆、章”,以为“斤斤以此为我们的成功,所见未免太小”。而“我们”的大成功,包括“精神”与“实际”两方面,前者仍是“学生牺牲”“社会制裁”“民众自决”三条,后者则是“思想改革的促进”“社会组织的增加”“民众势力的发展”。“社会组织的增加”一节中谈及“从前这个学校的学生和那个学校的学生是一点没有联络的,所有的不过是无聊的校友会,部落的同乡会;现在居然各县各省的学生都有联合会。从前这个学校的教职员和那个学校的教职员也一点没有联络的,所有的不过是无聊的教育会,穷极无聊的恳亲会……从前工界是一点组织没有的……从前商界也是一点组织没有,所有的商人,不过仰官僚机关的‘商务总会’底鼻息。”末了总结道“总之五四以前的中国是气息奄奄的静的中国;五四以后的中国是天机活泼的动的中国。‘五四运动’的功劳就在使中国‘动!’”“五四”之前号称代表民众的团体在罗看来一无是处,所作所为谈不上使中国

① 仲九《五四运动的回顾》,《建设》第1卷第3期,1919年。该文另在1919年10月5—16日《民国日报·觉悟》副刊连载。

② 陈独秀《陈独秀最近之演说》,《时事新报》1920年4月22日,第3张第1版。

③ 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晨报》1920年5月4日,五四纪念增刊第2—4版。



“动”，“五四运动”“成功”的一面，便只能在于其间新崛起的势力（主要指学生与普通“国民”）与相应能令中国“动”起来的方式（主要指民众更直接的组织与行动）。

综上所述，“五四运动”一词在其诞生初期，先是专指北京五四事件，但稍后也可以从五四事件当日向后延伸，涵括6月间的运动。这是基于将“起点”定为“焦点”的逻辑，起点之名遂可作为整个五六月间运动的代称。此种逻辑与“代称”机制的成立，应有“五四运动”之“诠释”的作用，此种诠释重“开创”而轻“传承”，且自始便未为该词最先的一批使用者所垄断，之后也不是对于1919年5月以降反日爱国运动的全面而中性的概括。其间实际仍可发挥正面作用的“民”之代表的角色，在这些诠释中或淡化、或消失、或负面化；这其实是论者以诠释“现实”运动的口吻，表达对于相关“前景”的期望（亦即以“实然”的口吻表达“应然”）。<sup>①</sup>总之，此种诠释在指涉的主体与活动方式上，不约而同地淡化了实际运动过程中“承前”的一面，因而可认作是对五六月间反日运动之复杂脉络的“简化”。

不过，在此“简化”之外，某种“再复杂化”也已经开始。淡化“承前”，往往意味着强化“启后”，而对新符号所提示之前景的设想规划不免言人人殊，“五四运动”的诠释便又在另外的维度上走向了多歧化。

### 三 再复杂化：诠释的分途

因“五四运动以后/以来”之类的句式在报刊中的流行，将“五四运动”视为起点、续上后来的某些事件，在1919年5月下旬以后便渐成一种表述套路。而这也很快影响了“五四运动”的诠释本身，如1920年“五四”纪念中一篇文章所反映的逻辑：

去年五月四日霹雳一声，忽然发生“五四运动”。……世人往往把“五四运动”看作政治的运动或且是国家的运动，我以为是社会的运动国际的运动。……我们虽然没有参加“五四运动”，但是从“五四运动”以来底宣言和行动看起来，可以证明“五四运动”的确是有这种性质。<sup>②</sup>

此处“五四运动”仍指1919年北京五四事件，但论者是否参加了五四事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论者所见“‘五四运动’以来”的宣言和行动，能反过来用以证明“五四运动”的“性质”。作一譬喻，即“五四运动”成为一挂钩，以悬挂的物件样式来诠释挂钩本身的性质。而如前所述，“五四运动”至迟到1919年下半年可以专指五四事件，也可代指五六月间的反日爱国运动；那么在所指时段延展至最大后，又应具体选择哪些事件或趋势，继续挂接在“五四运动”之后，便成为诠释分化的一大关键。

显然，“五四运动”诠释的后续分途甚为多样，难以尽述。本节不拟探讨一些太过细致的分歧，仅择取部分趋新的教育界人士给出的诠释与部分倾向国民党立场的读书人的诠释为例。这两大类诠释均默认“五四运动”以“学生”为主体（偶尔扩及工商等“国民”），并均有与诠释相辅相成的实践措施，因其间一些细节今人所论已极详，笔者只是基于本文的问题意识对此再作一番概述。

前一类诠释，通常关乎“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所指涉之思想文化运动的衔接。需要指出的是，此种爱国运动的后续，不一定会自然而然地连上更“新”的思想文化潮流。如1915年“五七”符号出现后，时人且有一些倡言“国学”以图湔雪国耻的言论与措施。江苏无锡人侯鸿鉴倡言教育救国，却提出“国学、国耻、劳苦三大主义”，其中“国学”教育一节乃是强调师范与小学教育中“六书”与旧体诗文之类的训练。<sup>③</sup>乃至在1919年反日运动期间及之后，各地老辈与学生亦多有创

<sup>①</sup> 此略如罗志田所言“以希望代事实”的诠释方式，见罗志田《课业与救国：从老师辈的即时观察认识“五四”的丰富性》，《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

<sup>②</sup> 渊泉（陈博生）：《五四运动底文化的使命》，《晨报》1920年5月4日，第2版。

<sup>③</sup> 侯鸿鉴《国学国耻劳动之三大主义》，《中华教育界》第4卷第6期，1915年；侯鸿鉴《国学国耻劳苦三大主义表例》，《教育杂志》第7卷第7期，1915年。

作或引用旧体诗词以记述此番运动、宣扬爱国之义者。故“五四运动”后的思想文化运动内容专指“新”思想或“新”文化,很大程度上应理解为某些一贯趋新者在表述与实践中的积极“引导”的表现。除却北大背景的学人、北京《晨报》及上海《时事新报》等鼓吹者与各地趋新出版界人士,不容忽视的尚有部分省教育会,尤其是江苏省教育会的作用。<sup>①</sup>至于“新思想”“新文化”具体指哪些内容,可以是欧美新教育、白话新文学、个人本位、世界主义等等,此处不赘。而北京五四事件当日,或五六月间的爱国运动中是否真能凸显这些思想文化内容,已非关键,关键在于为“五四运动”“接续”内容的论者自身的倾向与选择。而除却在“五四”之后接上“新文化运动”,尚有将“五四”之因溯至之前由《新青年》《新潮》等刊物标示的思想文化趋势的表述,在今人看来,大致相当于将“新文化运动”的所指再向前作出跨越“五四运动”的延伸。

这类回溯式表述在早期的普及与接受度,不宜估计过高。如《新青年》同人对五四事件实无多少参与,新潮社中人在初期学生运动中的地位,同样存有疑问。1919年五六月间,关乎五四事件之起因的大多数论述,多从“二十一条”(或再往前的中日或中外关系)述至青岛问题之发生,即专注于政治外交层面。此间将五四事件本身的肇因“思想史”化的文章则较少,其中一类文字实与安福系一方的思路接近、唯价值评判相反,即正面肯定蔡元培执掌北大后的革新与五四事件之发生存在因果关系。但此种关系建构多聚焦于北大整体与蔡氏,<sup>②</sup>阐发陈独秀、胡适诸人及《新青年》对于爱国运动之发生的作用者则更少。陈独秀于6月11日被捕,有报文提及人言北京学潮“实发难于北京大学”,而北大此次表现远比1915年“五七”当时激烈,当系蔡、陈等鼓吹“新思想”所致。<sup>③</sup>另外,尚有同在6月间发表的日本黎明会吉野作造所撰、李大钊节译的《吉野博士对我国最近风潮观》一文。<sup>④</sup>该文在解释五四事件之起因时,着重揭出蔡元培掌校后北大的“新旧”之争,且专门提及“北京大学发行之杂志,则皆口语体,乃至投我(吉野)之书翰亦用口语,且横书,并加以:!?等符号,而其小说之类,尤极敢言,就中如陈独秀君对于孔孟学说之批评毫不客气,彼旧派学者之愕然惊惧,殆非无因也”。联系其他段落,政治立场之别与“文”“学”之新旧,在此基本被混为一谈。该文曾为多家报刊转载,或产生过一定影响;不过,这也是北大学生所编《五四》一书“舆论”部分中唯一一篇将“五四运动”归因于《新青年》《新潮》之影响的文字。<sup>⑤</sup>

进一步讲,如今人指出的,倡言“文化运动”,本可能存有以“文化”纠正五四运动的“武化”之意。<sup>⑥</sup>故“文化运动”在当时之于“五四运动”并非只有正相关,且可能是反相关,这一反相关在1919年秋各地多数学生返校求学后,可能基于蔡元培、胡适等人的影响,一度变得较为突出。进言之,1919年5月间体制内外各方势力团体“同仇敌忾”的情景,至1919年末、1920年初已难得见。再至1920年5月初,江苏省教育会与苏省众多教职员联合发表宣言,将不愿返校的罢课积极分子开除出“学生”队伍。<sup>⑦</sup>之后,全国及上海的学联与各界联合会在法租界的会址被查封;北洋政府强令全国各地学联停闭、各校恢复上课。与1919年不同,一年后仍由皖系把持的北京政府较顺遂地实现了对于学生运动的压制,这也从反面提示了前一年学生运动的蓬勃开展,并非学生独力可以达成,实

① 参见桑兵《“新文化运动”的缘起》,《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关键年代的小历史——1919年的事件与日常》,《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1期。

② 按蔡元培可被视为老“革命党”,相应地,某些原国民党人在五四事件后不久即已强调的“新旧”对立,主要是政治意味的,即凸显蔡及新“青年”与(北洋)旧“官僚”的对立,甚至革命党及受其影响者几可被认为天然地居于“新”之地位。见《学校一致纪念国耻(续)》,《民国日报》1919年5月11日,第10版;湘君(叶楚傖):《北廷对北京大学之隐秘》,《民国日报》1919年5月12日,第2版;湘君《北京大学之精神保存》,《民国日报》1919年5月20日,第7版。

③ 《陈独秀被捕》,《申报》1919年6月15日,第7版。

④ 《吉野博士对我国最近风潮观》,《晨报》1919年6月18日、19日,均为第6版。又见《民国日报》1919年6月20日,第6版、6月21日,第3版《东方杂志》第16卷第7号,1919年。

⑤ 按《五四》的编者杨量工(亮功)晚年明言“五四运动”纯系“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完全无关”,见杨亮功《〈五四〉重印序》,蔡晓舟、杨亮功编《五四:第一本五四运动史料》,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⑥ 袁一丹《另起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3期。

⑦ 《江苏教育同人处置罢课学生之宣言》,《民国日报》1920年5月5日,第10版。

离不开其他包括非一般民众在内的势力团体的广泛支持。

也是在此背景下,1920年5月间,迎来了第一个“五四”周年纪念。北京《晨报》为此专设纪念增刊(一张共4版,该年“五七”未设专版),另辟第7版为纪念增刊附录。供稿者有梁启超、蔡元培、蒋梦麟、胡适、顾颉刚(颉刚)、罗家伦、郭绍虞、黄炎培、陶孟和、朱希祖等,以京沪学界人士居多,这些文章也多见于当时的其他大型报刊。各文内容自然各有重点,但在总体上,均倾向于将“五四运动”的后续发展或正面意义导向主要依托学校进行的“文化运动”。梁启超便明言,“五四运动”虽为“政治运动”,但“实以文化运动为其原动力”;反过来讲,“一年来文化运动盘[磅]礴于国中”,亦“什九皆‘五四’之赐也”。据此,“今后若愿保持增长‘五四’之价值,宜以文化运动为主而以政治运动为辅”。<sup>①</sup>蔡元培所论,则更多“反相关”的意味,强调“去年五月四日,是学生界发生绝大变化的第一日”;学生罢课比罢工罢市的损失还要大,故学生务必返校“专心研究学问”。<sup>②</sup>蒋梦麟、胡适同样提到“学生运动现在四面都受攻击,五四的后援也没有了,六三的后援也没有了”,便只剩下回校就学一条正路。<sup>③</sup>顾颉刚甚至把请愿、罢业之类的手段比作“伏阙上书”“清君侧”,无足称道,当前应从事的是“教育”与“学术”运动。<sup>④</sup>罗家伦总结“五四运动”“失败”的方面,也谈及“这次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不问时势,不问实力,没有筹备,便贸然议决全国罢课,是错误的。弄到现在上海发难的地方,工商界都不表同情,仅仅华工罢市,一日后也都恢复;再做也难于做得下去,而各处七零八碎的罢课风潮,又将何以收拾。老实说,这实在是我们一年以来最大最后的失败!”其应对之方,亦是倡议学生从事社会、文化运动。<sup>⑤</sup>在文化运动之价值的对照下,政治性学生运动的意义多被弱化乃至负面化,此番“五四”纪念名为“纪念”,实有部分趋新学人力图在诠释中压抑他们所谓的“五四运动”的消极面、为五四事件以降的学生运动“善后”的意味。

与之适成对比的是,部分国民党系的报章舆论,则希望五四事件以降的学生能更多地现身街头,更长久地从事“爱国”运动。虽然目前所见“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最早出处正是国民党系的刊物《星期评论》与《建设》(1919年8月31日、9月1日),之后“新文化运动”在国民党人的文本中也时见正面意义,但国民党人对通常由北京与东南教育界中人倡导的文化运动的认可与参与度,整体上较为有限。<sup>⑥</sup>其关注点通常在社会与政治,而终极目标仍在政治层面。实际上自一开始,其对五四事件的诠释路数便已进一步“内”转,即借此以全力攻击“北廷”。而稍后一度有意限制罢课的学界势力团体(如江苏省教育会),也成为报文的重要攻击对象。<sup>⑦</sup>再后,相对更认可“文化运动”的胡汉民等人,也只是说学生求学、救国可以“同时并做”。<sup>⑧</sup>至1920年“五四”周年纪念,《民国日报》复登出时评称“‘五四’运动,全国国民没有一个不承认他是爱国运动,也没一个不愿意加入这爱国运动。”但因未能彻底扳倒北洋政府,运动结果并未令人满意。<sup>⑨</sup>对于5月初江苏教育界开除罢课学生的宣言则讽刺称“至于爱国行动的能力,江苏教育同人所表现的,不过几通电报而已。”<sup>⑩</sup>不久又登出来件,径称一年以来“教育家”阻挠学生“爱国运动”,实属“不知羞耻”。<sup>⑪</sup>

或如李大钊所盼望的,“五四运动”在此后历年的纪念中又被不断加上了一些“新意义”,<sup>⑫</sup>但可

① 梁启超《五四纪念感言》,《晨报》1920年5月4日,五四纪念增刊第1版。

② 蔡元培《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晨报》1920年5月4日,五四纪念增刊第1版。

③ 蒋梦麟、胡适《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晨报》1920年5月4日,五四纪念增刊第1版。

④ 顾颉刚(颉刚):《我们最要紧着手的两种运动》,《晨报》1920年5月4日,五四纪念增刊第1—2版。

⑤ 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晨报》1920年5月4日,五四纪念增刊第2—4版。

⑥ 参见欧阳军喜《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以〈星期评论〉、〈建设〉为中心》,《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⑦ 湘君(叶楚傖):《论上海学生的罢课主张》,《民国日报》1919年5月22日,第2版;孙镜亚《告江苏省教育会》,《民国日报》1919年5月31日,第12版《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纪事》,《申报》1919年6月17日,第11版。

⑧ 胡汉民《学生和文化运动》,《民国日报》1920年1月5日,第13版。

⑨ 际安《时评三》,《民国日报》1920年5月4日,第11版。

⑩ 际安《江苏教育同人的宣言》,《民国日报》1920年5月5日,第11版。

⑪ 公展《告所谓教育家者》,《民国日报》1920年5月10日,第2版。

⑫ 李大钊《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晨报》1921年5月4日,第3版。

以说,1920年的首次“五四”周年纪念,已为之后各方的纪念诠释定下了某些基调。自1921年起,《晨报》的纪念仍多从文化运动角度诠释“五四运动”,只是从政治运动角度作诠释者亦已不时见诸报端,至于“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究系正相关还是反相关,所论也愈形模糊。<sup>①</sup>而在国民党系的报刊中,文化运动的角度虽亦时见于诠释,但以“五四运动”为政治性的运动,仍是主要论调,《民国日报》的“五四”纪念且屡屡强调教职员与学生在此问题上的对立。1921年,有人虽然提到“现在教育界底恶劣,受‘五四运动’底赐真是不少”,但“恶劣”的主因却在勾结“官僚”或自身颓废的教职员(而非学生)一面。<sup>②</sup>后来该报的社论甚至宣称“挂了胡子的教育家”“妨害爱国运动,比军警还力”,警告学生切勿以之为盟友。<sup>③</sup>

同时,由于中共组建、国共合作,“国民革命”话语兴起,“爱国”议题与马列主义的“阶级”“反帝”话语进一步汇合,学工商群众运动亦开始与国共两党的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在两党的表述中,“反日”扩展为“反帝”,反“国贼”、反“北廷”引申为反“军阀”,“五四”遂为“反帝反军阀”的“学生运动”或“国民革命运动”。需要指出,1919年五四事件中同属北洋系的直系未成主要目标,1920年尚有论者强调“五四运动”“很好的影响”之一,正是“揭破安福部的内容,结果有这次吴佩孚扫清北京的举动”。<sup>④</sup>不过,控制北京政府的派系改换,不妨碍国共方面继续一概目之为“北廷”或“军阀”。由此,一种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共享的标准叙述开始形成,即所谓“中国的民族运动自从五四运动才渐渐变成近代的民族运动——有组织的群众的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运动”。<sup>⑤</sup>

“五四运动”的所指本身,也开始正式包含原属“五四运动以来”的内容,所谓“广义的五四运动”于是出现,明指1919年整个五六月间的反日爱国运动,“狭义的五四运动”仍专指北京五四事件。<sup>⑥</sup>而在上述两大类诠释以外,曾琦等国家主义派,则力图将“五四运动”诠释为“国家主义运动”。<sup>⑦</sup>这些诠释之间固然存在一定的互渗,但整体上也显然存在矛盾。1926—1928年国民党北伐成功,政学局势相应发生变化,某些论者便对新近楔入本地域或本“场域”的一些诠释明确表露出“陌生”或抵触之感。如1928年一位东南教育界人士所提及的:

且看五四运动的精神受第一个打击的是什么,不是从五卅惨案以后死灰复燃的国家主义派吗?自从五四运动以后,教育的目的、教材和教法,无往而不是个人主义或世界主义的色彩,但是从五卅事件发生以后,国耻教材又是占小学教材的重要地位。……自从最近的革命潮流达到长江流域以来,时代的思潮又是为之大变。就是拿清党前后的变化姑置不论,就大体上讲,那团体化纪律化几字实在已经拿五四运动的方向,完全改变。……试问五四运动中所包含的个人主义之思潮,还有他照样存在的余地吗?五四运动的精神要继续吗?<sup>⑧</sup>

此处论者正是以个人主义、世界主义之类为“五四运动”真正的“精神”,而将“国耻”教育、国家主义、团体化纪律化视为对此精神、方向的“扭曲”。事件基点相同的诠释,可因事件后续所接的内容差异而彼此疏离到这等程度,“五四”符号使用者内部的歧异之巨,实已不亚于早先用与不用“五四”符号的论者之间的思想分别。

① 尤其是1925年段祺瑞再次主政,《晨报》论者便将该年“五四”前的政治状况与1919年作比,见龚漱沧《五四运动纪念日的感想》,《晨报副刊》1925年5月6日,第5版。

② 霞《“五四运动”的两周纪念》,《民国日报》1921年5月4日,第2版。

③ 心如《“五四运动”二周年的感想》,《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5月4日,第4版;力子《五四运动的精神》,《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5月4日,第4版;楚伦《“五四”运动后的学生》,《民国日报》1923年5月4日,第2版。

④ 王无为《各地文化运动的调查:五四运动的影响》,《新人》第1卷第6期,1920年。

⑤ 太雷《五四运动的意义与价值》,《中国青年》第4卷第77—78期,1925年。

⑥ 文叔《五四运动史》,《学生杂志》第10卷第5期,1923年。

⑦ 曾琦《五四纪念与五九纪念》,《醒狮》1926年5月9日,第1版。

⑧ 沈佩弦《五四运动的精神要继续吗》,《苏中校刊》第1卷第7期,1928年。

## 四 并存的“五七”与“五四”

以上主论“五四运动”诠释本身的兴起过程及其反映的诉求与逻辑。但须强调，“五七”与“五四”两个符号也并非被取代与取代的关系。在1920年代的京、沪大报中，通常是每年5月4日登有周年纪念的新闻与评论，5月7日或9日左右另有“国耻”纪念的新闻、社论时评，后者的诠释路数集中于政治外交方面，较之“五四”更为稳定。而在京、沪等大都市以外，其他地方纪念“五七”与“五四”的热忱亦不完全一致。如湖南长沙，1919年5月7日及9日因当局戒严，未实现大规模集会活动，但自1921年起的纪念仍以“五七”为主，“五一”亦有盛大纪念，“相形之下，夹在中间的五四显得相当寂寞”。积极鼓吹新文化的长沙《大公报》此期亦鲜有对于“五四”的报道，这一情形直至1925年后才有改观。<sup>①</sup>其实，在1920年代初对“五四”纪念相对淡漠，可能只是因为该地多数人不知、或不惯使用“五四运动”一词而已。广而言之，在表述中不使用“五四(运动)”一词，并不能说明这些人不知或未参与民八反日运动。可以推测，“五四(运动)”这一符号初期传播的实际地域范围与民八反日运动的扩散范围很可能并不一致。<sup>②</sup>

除却地域范围，尚有迎拒这一符号的“人群”范围。也即相对“五四”，“五七”纪念的主体一直较为开放，是否系国家权力体系外的“学工商”(实际“工商”纪念“五四”也明显不及“学”热烈)、思想究竟偏新偏旧，在此均非关键。如1920年江苏无锡刊行《国耻》杂志，无锡人徐旭高在发刊辞中从甲午战争叙至1919年的青岛问题，主张要洗雪“五九之耻”，而未及“五四”。<sup>③</sup>刊中登载研究系要人林长民的《告日本人》一文，另外且曾通告征文，应征者来自各年龄段(包括学生)；然而通刊均出以文言，仅登载的小说可见旧式白话语句。

在另一面，对于既使用“五七”也使用“五四”符号的个人或势力团体而言，因同在5月上旬，“五四”与“五七”尚能联成一气得到纪念。在此方面，国民党人似表现得尤为积极。如1920年，戴季陶即明确给出了“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五九”的纪念日序列。<sup>④</sup>这些日期符号尚可彼此影响，遂使得各自的诠释重点发生些许调整。其间，“五七”或“五九”的诠释亦进一步“内”转，如1923年上海国民对日外交大会创办的《五九》杂志中称“愿国民毋忘五九之由来”，强调“无袁世凯则无军阀，无军阀则无卖国贼，无卖国贼则二十一条亦早无存在之地矣”，<sup>⑤</sup>即“雪外耻先雪内耻”之意。<sup>⑥</sup>“五四运动”则被认为是“国民自决的动机，是国民革命的先锋，是麻木社会的一服兴奋剂”。<sup>⑦</sup>加以“五一”作为劳工运动纪念日，“五五”先为马克思诞辰纪念日，后又加入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出任非常大总统的意义，<sup>⑧</sup>这一纪念日序列便明确构建出1915年以降一段以国民党为“正统”的历史，渐形成对于该党之主义与政策的系统宣扬。

此种符号间的相互影响，不仅体现在积极使用符号者的表述中。自1920年起，北洋政府当局就力图遏止成规模的“五四”“五七”乃至5月间所有在日期符号下进行的纪念活动。对此《民国日

① 凌云岚《地方历史中的五四——民国时期湖南的五四纪念》，《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6期。

② 一些学者谈到，1922年尚有学生在北大招生考试中不知“五四运动”何意，相关材料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37—738页；嘉谟《青年生活与常识》，《学生杂志》第11卷第9期，1924年。但其实不知“五四”之名，不等于这些学生必然未有参与民八反日运动之实，只是1919年5月4日北京发生何事(京外地方这一天通常是无事的)，他们的记忆可能已模糊了。

③ 竹园(徐旭高)：《发刊辞》，《国耻》1920年第1期。

④ 季陶《“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五九”》，《民国日报》1920年5月4日，第2版。

⑤ 天工《发刊词》，《五九》1923年第1期。

⑥ 沈选千《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国耻》，《五九》1923年第2期。

⑦ 《“五四”纪念会宣言》，《国民对日外交大会(五九)特刊周年纪念号》(1924)。

⑧ 这一序列在1925年后又加入“五卅”纪念，1928年后又加入“五三”济南惨案纪念；而国共分裂后，“五五”对于国民党就只剩下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的意义。

报》曾讽刺道“军警与官场方面,是从五月一日起要如临大敌到五月九日的了。”<sup>①</sup>1925年,《现代评论》亦刊文称“‘五四’和‘五七’这两个纪念,从性质上讲,本来是绝对不同的两回事”;“五四运动”本即侧重对内,当局的反应尚可理解,但将“五七”纪念也发令禁止,“那就不免令人疑他害起了神经过敏的病了”。<sup>②</sup>“五四”连带“五七”纪念被中央政府明令压制,这等于反向助长了“五四”诠释的反当局倾向,以至将该倾向进一步“传染”给了对于“五七”的诠释。

除却意义的调整,尚有各符号在情感色彩上的明确“分工”。当时虽有论者称“五一”“五四”“五九”均是“纪念痛苦”,“劳工屈于资本家,学生屈于政府,中国屈于强邻,所屈之事不同,其无理则同”,<sup>③</sup>但更多论者以为这几个日期符号意义或偏积极或偏消极,可引发参与者不同的情绪反应。如曾有清华学生谓“只有五四的精神,可以消灭五七的国耻。”<sup>④</sup>复有人称“‘五四’的运动可以说是新潮的始流,‘五七’的纪念可以说是亡我中华的先声!”<sup>⑤</sup>1926年曾琦撰文称“五四”“五九”“五卅”虽系同一纪念,“而有悲喜之异焉”。“五九”与“五卅”均是“奇耻”,独“五四”不然,“其举动之壮烈,其影响之宏阔,与夫意义之重大,皆令人可歌可泣而复可喜”,“要之,五四运动实为乐观的而非悲观的,此所以吾人一谈五四则神为之旺,气为之壮;一谈五九,则心为之痛,发为之指”。<sup>⑥</sup>“五七”(或“五九”)与“五四”—“悲”—“喜”相关的纪念日序列便可形成一个在情感上波澜起伏的有机体。此类看法之后也反映在国民党系的舆论中,如1927年一则关于“五七”的告民众书所云“今天是我们最沉痛的国耻纪念日,在这最沉痛的当中,我们联想到‘五四’和‘五五’的壮烈的革命事迹,于是我们又百倍的奋兴了!”<sup>⑦</sup>

总之,“五七”符号在“五四”符号诞生后仍有其生命力;<sup>⑧</sup>且因纪念主体的相对开放性,其在1920年代的受关注度及相关纪念活动开展的范围程度可能也并不亚于“五四”。<sup>⑨</sup>只是对于“五七”的诠释,在一些人那里或与五四事件之前并无多少差异,但在一些同时接受“五七”与“五四”符号的论者的表述中,其诠释重点已因符号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发生了些许变化。可见“五四运动”诠释的演变并非孤立事件,这一新符号的诠释脱胎于充斥着“五七”旧符号的政治运动氛围,而后新符号的诠释演变又对旧符号的诠释造成了无可忽视的影响。

## 结 语

“北伐成功以来,所谓吃五四饭的都飞黄腾达起来。”<sup>⑩</sup>“五四运动”的诠释继续发生变动。约自1930年代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提法亦趋流行,乃至发展出“五四运动”的最广义(即该词本身大致等同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便是“五四运动”这一挂钩与某些所选的悬挂物进一步合并,

① 《北京专电》,《时事新报》1920年5月4日,第1张第1版;湘(叶楚傖):《替谁遏止爱国运动》,《民国日报》1920年5月4日,第7版。

② 皓《“五四”和“五七”纪念》,《现代评论》第1卷第22期(1925)。

③ 鹤年《对于五一、五四、五九之感想》,《苏州晏成中学季刊》第2卷第1期(1922)。

④ 景《“五四”与“五七”》,《清华周刊》第281期(1923)。

⑤ 兴保《过“五四”“五七”纪念的感想》,《青声(天津)》第41期(1924)。

⑥ 曾琦《五四纪念与五九纪念》,《醒狮》1926年5月9日,第1版。

⑦ 《为“五四”“五五”“五七”纪念告民众书》,《政治训育》1927年第11期。后来李公朴也提到,“五一”和“五四”应用“红字”标识,“五九”“五三”则用“黑字”标识,见李公朴《怎样纪念四个伟大的“日子”:“五一”“五三”“五四”“五九”》,《读书生活》第2卷第1期,1935年。

⑧ 1940年,“五七”纪念才被“七七”国耻纪念正式取代,参见苏全有、邹宝刚《从〈申报〉的报道看“五九国耻纪念日”的兴衰》,《开封大学学报》第25卷第3期,2011年。

⑨ 如1929年的一则消息称,该年的“五四”情形甚是冷清,而“五七”“五九”则是上海、北平、南京、汉口、清江、青岛等地均有开会纪念,情形似要更热烈一些,见《“五一”“五三”“五四”“五七”“五九”之各纪念》,《真光杂志》第28卷第5期,1929年。这或与“五七”纪念的主体较为开放有关,在国府取缔校外学生运动后,更依赖学生参与的“五四”纪念活动便易显得“冷清”。

⑩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614页。

而统冠以挂钩之名,导致名词所指本身的继续扩展。对此后人讨论已不胜枚举,本文不拟重复,唯须强调如上所述,1930年代及之后开展相关论述、阐释的某些基准与套路,在1919年至1920年代前中期实已出现或形成。

概括来说,对于“五四运动”诠释的诞生与初期演变过程,今人研究似乎仍显不足。若说国、共及其他(通常倾向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五四”诠释之别是今人高度关注且不断予以细化的问题,<sup>①</sup>那么本文关注的就是在时序或逻辑上“前于”该问题的一个问题,即差别的建构非仅出现在稍后国、共及其他知识分子之间,而是在“五四运动”诠释的诞生伊始即已出现。“五四运动”的诠释自始便蕴含着某种围绕指涉的主体与活动方式的排斥机制,及与某些旧符号(如“五七”)的区隔机制(当然也不是变得与“五七”完全无关)。这正意味着对于当时复杂历史脉络的“简化”,唯在“简化”之余,又在另外的维度上发生了诠释的“再复杂化”。此类诠释之变与历史实相诚有联系,并且参与塑造了当时及后续的历史;可务必指出,话语与实相间的种种张力,亦不可一笔勾销。许多时候,此种诠释是以评述“现实”运动的口吻,表达对于“未来”的规划期许;倘将“五四运动”的诠释不假思索地视作对于它所号称要归结的过程与情境的准确归结,便将使研究者预先认可此类诠释与生俱来的倾向性与对历史内容的选择性,以部分历史中人的遮蔽为研究者自己的遮蔽。

进一步讲,本文所论尚有助于我们深化理解在现今围绕“五四”符号的叙述中某些“边缘”角色何以边缘化、“失语者”何以失语的问题。此类叙述中的“失语者”,不一定自外于实际的运动过程,相反,他们且有可能是民八反日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姑举一例,如今人已注意到的山东省议会副议长王鸿一,是1919年4月以降鲁省反日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但他对学生运动一直持保留态度,至1920年初,又对北大“新潮”表示怀疑,曾与蔡元培、李石曾会晤,只觉二人“莫名其妙”。<sup>②</sup>而如蔡元培、胡适等人,同样对学生运动持保留态度,甚至对民八反日运动的参与度较王氏更为有限,却可在后来成为最广义的“五四运动”中的要角,比照“五四运动”的开初所指,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深具吊诡意味的现象。对于王鸿一这些人在语词诠释与历史叙述中之形象与地位变迁,及其在“五四”时期之后言论活动的深入考察,或可成为五四运动研究一个后续的努力方向。

(本文受2019年度上海社会科学院院自报课题资助)

(责任编辑:杜倩)

<sup>①</sup> 明确按国、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等阵营分别论述“五四运动”阐释史的研究,见张艳《五四运动阐释史研究(1919—1949)》,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05年。

<sup>②</sup> 参见季剑青《地方精英、学生与新文化的再生产——以“五四”前后的山东为例》,《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09年第2期。

**The 1900 Self-Denunciation of Qing Government: A Modern Metamorphosis of Traditional Politics** **ZHENG Ze-min**

In August ,1900 and February ,1901 , Empress Dowager Cixi and Emperor Guangxu issued imperial edicts denouncing themselves in exchange of the peace with foreign powers. Originally , the goal of the self-denunciation of an imperial government was to pacify the people. By then , the goal shifted to suing for peace. This change revealed that the foreign powers' support was indispensable to Qing's rule.

**Shedding New Light on Governor-Generals' 1910 Urge to Set up Parliament** **SHI Zhan**

In the third round of petition for parliament , the Governor-Generals urged the imperial court to implement the political reform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present paper analyzed in detail the governors' suggestions and requirements. The court finally made concessions and agreed to set up the parliament in the fifth year of Xuantong Reign. Researchers should not readily shift blame on the decision-makers.

**May Seventh or May Fourth: The Germination of May Fourth Hermeneutics and Its Early Evolution** **XU Jia-gui**

The May Fourth hermeneutics was selective and tendentious. It was a mixture of minimization , simplification and ( re-) complic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different political symbols. The present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germination of May Fourth hermeneutics and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its incipient stage , hoping that it can shed new light on the correlation and tension between the history of May Fourth and the historical May Fourth.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Schools and the Appropriation of Temple Propert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CHEN Ming-hua**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 in order to cooperate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county system ,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designed a large-scale national school popularization plan. Most of the funds for running school were funded by local society. Temple property was the main object of allocatio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nce tried to let all localities set up "temples for public welfare committees" on the basis of the existing religious network , which led the allocation of local temple property. However , this model had little effect because of 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on temple property registration and disputes over local interests. In this case , the local government turned to support the radical allocation model of grass-roots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 in order to avoid the restrictions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Foundation , Operation and Fate of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ZHONG Jian**

At the beginning of its foundation , Chung Cheng University was sponsored by local authorities , and had close links with Chiang Kai-shek and Xiong Shihui. Having responsibility but no power , Chen Lifu , 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 was displeased and then supported Hu Xiansu who had the courage to confront Chiang Kai-shek and Xiong Shihui. This particular power structure deeply affected the operation of the university.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 the university distanced from Chiang Kai-shek and Xiong Shihui , and became administer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 but didn't obtain much attention.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financial difficulties and frequent student strikes , the fate of Chung Cheng University was doomed.